

**编者按：**2019年7月5日，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将中国江苏省盐城市的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该项目成为中国第54处世界遗产，第14处世界自然遗产，江苏首个自然遗产，填补了我国滨海湿地类型世界遗产空白，成为全球第二块潮间带湿地遗产。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是一个系列世界遗产申报项目，包括16个申报点。此次成功跻身“世遗”的“第一期”范围包括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部分区域、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境、盐城条子泥市级湿地公园、东台市条子泥湿地保护小区和东台市高泥淤泥质海滩湿地保护小区。该区域主要由潮间带滩涂和其他滨海湿地组成，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枢纽，是全球数以百万迁徙候鸟的停歇地、换羽地和越冬地。这里为23种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鸟类提供栖息地，支撑了17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物种的生存，包括1种极危物种、5种濒危物种和5种易危物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为，这里是珍稀濒危候鸟保护的不可替代的自然栖息地，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

申遗成功的背后是盐城人长期以来坚持对湿地的严格保护。退耕还湿、退渔还湿，沿海停止围垦，进行生态补偿，守护湿地的生态文明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为守护好大美湿地，盐城在上个世纪先后建立珍禽、麋鹿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保护区先后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珍禽保护区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网络成员。进入新时代，盐城积极探索绿色转型、绿色跨越发展路径，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今后，盐城应该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生态系统治理，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格局中谋划开发利用，努力将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发展优势，打通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切实做好生态保护这篇“大文章”。

申遗成功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开始，对湿地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永远在路上。本期推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发展”专题，认真探讨世界自然遗产申报成功后如何进一步加强保护与管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站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高度去推动湿地保护和旅游发展工作，持续扩大盐城好生态的影响力。希望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 本期专题 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发展

- 02 让世界遗产瑰宝永远绽放“中国精彩”
- 04 瓦登海经验对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的启示
- 07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旅游景区的管理问题与对策
- 09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的旅游开发模式
- 13 可可西里：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科学保护之路

### 全球大观

- 16 日韩经贸纠纷解读

### 经济纵横

- 18 城镇化的现实难题与潜在红利

### 文化漫步

- 19 垃圾分类，其实大有讲究

### 悦读时光

- 封三 “家庭作业”还是“家长作业”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科

主 编：戈建虎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微数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让世界遗产瑰宝 永远绽放“中国精彩”

30多年来，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利用和管理等方面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目前，我国共有世界遗产55项，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国。



自1985年12月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30多年里，我国关于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理念不断升华，在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还有效保护了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迹，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探索实践了包括国家公园制度在内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显著提升了公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和保护意识。“我国是30多年来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自然遗产、双遗产的数量均位列世界第一，两项合计占全球同类遗产总数的6.8%。”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周志华在北京召开的“2019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有效保护了珍贵的自然文化遗产和自然生态环境，而且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利用，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我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囊括了自然遗产、双遗产和文化景观等以自然特征为基础的全部遗产类型，涵盖了自然美、地质地貌和生物生态三大突出价值的各个方面。

**世界遗产已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国家名片”**

作为开展科普教育、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目前，

世界自然遗产地共建立动植物保护、环境保护、地质科普等类型的教育基地46个，其中国家级教育基地23个。不仅如此，世界遗产既是国外游客更好地了解中国国情、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窗口，还是国内外游客首选旅游目的地。各遗产地开展适当的旅游展示活动，带动了住宿、餐饮、交通、土特产加工、手工艺制作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据统计，仅2018年，各遗产地就为地方带来直接旅游收入143.75亿元。有数据也表明，遗产地的境外游客比重远远高于其他非遗自然保护地，充分显示了世界遗产的国际影响力。2018年，遗产地接待境外游客超过1246.2万人次，占全国入境游客总人数的9.7%。

周志华称，世界遗产已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国家名片”。30多年来，我国世界遗产的蓬勃发展和国际交流，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保护自然生态和人类文明、谋求和平发展的不懈努力和责任担当，加强了东方与西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文明间对话，增进了不同国家、民族、信仰间的文化认同。

### 保护传承，从遗产大国迈向遗产强国

可以说，30多年来，中国的自然遗产事业发展迅速、成就显著，在自然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之路。周志华介绍说，30多年来，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结合自身国情，依托风景名胜区等法定保护地体系，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机制。

2014年，我国专门成立了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建立了世界自然遗产专家委员会，并在相关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设立了多个研究机构，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发展战略研究、政策制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提供技术服务和支撑。

为加强世界遗产地的统一规划管理，国务院在2018年机构改革中，将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

管理职能，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转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遗产地管理机构也在管理、技术、科研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支撑。

周志华透露，世界自然遗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我们将以保护和传承为核心，在世界自然遗产保护30多年工作的基础上，更好地履行《世界遗产公约》，把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以推动中国从遗产大国迈向遗产强国，让世界自然遗产这块瑰宝永远绽放“中国精彩”！

### 世界遗产保护压力依然巨大

世界遗产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自然区域和文化遗存。自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建立《世界遗产名录》以来，保护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理念作为人类应对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最具认同感的战略，在全球得到广泛传播。

据了解，目前，我国各遗产地管理机构共有管理人员超过1063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18%。各遗产地历年科研总投入约2亿元，参与合作研究的国内科研院所或高校91个、国际合作机构7个，建立国内科研基地53个、国际科研基地3个。我国共有12处遗产地与国外遗产地、国家公园等结成友好单位，开展务实合作，并通过学习借鉴国外遗产管理的有益经验，推动我国遗产事业发展。

眼下，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巨大压力依然存在、面临的威胁仍然存在，保护、利用与管理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和不足还有待逐步解决。少数地方生态保护意识不强，政治站位不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保护管理要求，重旅游轻保护的观念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 30多年我们这样走过

自1985年中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来，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30多年。在民间，申报世界遗产工作被亲切地称为“申遗”，就好像“申奥”一样，曾被大众看作是一项世界级的荣誉。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来说，世界遗产体系带给我们的价值并不等于一个国家遗产地的数量，也远不止一份国际荣誉那么简单。加入《公约》以来，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从观念到实践经历了变革。人们看待世界遗产体系的目光从不解到贯通、从质疑到交融，这个过程本身即是一段双向影响、不断深化的认知之路。回顾这段发展，大致可以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对世界遗产价值的认知过程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作“对世界遗产价值体系的学习”。20世纪80年代，作为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中国加入《公约》，不仅将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化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并且通过开放和交流汲取了国际先进保护理念，获取了必要的援助和技术支持。这个阶段，由于中国刚加入《公约》，对世界遗产体系的规则不是很理解，更多的是依据传统文物保护的思路在试验性推进。这个时期以1996年庐山国家公园申报世界遗产为一大分水岭——原本作为中国“文化遗产”建筑群项目申报的庐山国家公园在世界遗产委员会讨论后，由于突出的人文和自然综合要素，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文化景观”项目。然而这个结果在当时却因本土与国际理解之间的错位，被解读成“既不够格文化遗产，也不够格自然遗产”的折中之选，曾让申报者觉得十分失望沮丧。今天看来，确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价值的冲突和理念的表达”。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的讨论与发布，正式将东西方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价值冲突推上国际舞台。这场讨论不仅让国际学界正视东亚木结构建筑与西方不同的材料属性，并且促使中国重新思考我国传统观念与国际文本之间的深层关系，进一步从文化语境角度深入考量了世界遗产体系保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的初衷。2000年，基于中国文物特点所制定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发布，既体现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与国际共识的接轨，也代表了一份扎根中国实践、彰显本土特色的“宣言”。

第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中国探索对国际理念的融合与推动”。2011年，在对世界遗产类型深入研究认知后，中国第一次主动将杭州西湖申报为“文化景观”遗产类型，并顺利列入。与15年前庐山国家公园的被动申报所不同的是，此次申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关系，以国际化的语言作了充分阐述表达，标志着民族精神与世界遗产话语体系的融合。同时，中国在数十年间探索活态遗产保护方法所建立的“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名录制度，反过来推动了国际社会有关乡村遗产的实践与反思，从多个方面为国际组织制定全球“乡村景观”遗产的保护方法提供了多维度的贡献。世界遗产始终是中国向世界表达价值观，发出自己声音的重要舞台。过去，我们将申报的遗产地看作一个个独立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看作是对遗产地价值的最高肯定。但未来，它们必然将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向国际社会进一步讲述中国的历史观、文化观和美学观。

（2019-07-13 山西晚报）



# 瓦登海经验 对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的启示

生态系统和地质地貌的边界不一定与行政区划边界一致，因此产生跨界保护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跨界保护区定义为跨越国家、国内行政区（如省、地区、自治区）和/或国家主权或管辖范围之外区域的陆地或海域，主要用于生物多样性及自然与文化资源保护，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手段进行合作管理的保护地。世界自然遗产是国际公认的最高等级自然保护地，其跨界保护管理一直是国际研究和讨论的前沿热点问题。简言之，可将跨界世界自然遗产定义为跨越两个及以上国家或国内行政区边界的世界自然遗产。截至2018年，全球世界遗产共有1092项，其中209项自然遗产，38项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其中，跨界世界遗产多为自然遗产或双遗产，仅有少数文化遗产。目前国内关于跨界遗产地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以及旅游资源管理等方面，对涉及自然保护地类跨界遗产地保护管理方面的研究较少，国外案例研究也较为缺乏。涉及自然保护地的世界遗产主要包括自然遗产和双遗产两类，为方便表述，文中将涉及自然保护地的跨界遗产地统称为“跨界世界自然遗产”。本文在分析我国跨界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现状的基础上，对跨越德国、荷兰和丹麦边界的瓦登海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三边合作机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我国跨界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机制建立策略。



瓦登海

## 我国跨界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现状

截至2018年，我国共有世界遗产53项，包括文化遗产36项、自然和文化双遗产4项、自然遗产13项。其中，没有涉及跨国界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按地级为最小行政单元进行统计，共有7项跨省、跨地级行政边界的世界自然遗产。7项跨界世界自然遗产面积总和达278万hm<sup>2</sup>，占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地总面积的41%。

我国涉及自然保护地的遗产地主要是自然遗产以及自然和文化双遗产，这两类遗产和文化遗产目前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在自然遗产以及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方面，当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国家、省、遗产地三级保护管理体制，在每一层级都有相应的遗产地保护管理部门和机构。随着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包括世界遗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在内各类自然保护地均划归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实施统一管理，为涉及多个保护地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以及自然和文化双遗产的保护管理提供了有利契机。

当前，我国7项跨界世界自然遗产中，同省内跨地市遗产地主要由所在省级主管部门下设处室，负责遗产地的联合保护管理和协调工作，四川、新疆等还专门成立了省级世界遗产管理部门；中国南方喀斯特和中国丹霞2项跨省遗产则成立了跨省级的保护管理协调机构，负责解决跨界协调等问题。随着省和地方一级行政机构改革到位，跨界世界自然遗产地管理体制将进一步得到优化。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及自然和文化双遗产除受到《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约束外，还有国家层面的《风景名胜区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等10余部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世界自然遗产及自然和文化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管理提供支撑。省级层面也制定了《云南省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进一步促进了跨界遗产地

的法制化保护。

总体上,我国初步建立了跨界遗产地管理体制,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中国丹霞于2014年被列入全球228处保护状况“优秀”遗产地。然而,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类活动仍极大地威胁着我国世界遗产,尤其是跨界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完整性。而国家层面尚未颁布专门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法,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作为非法定规划约束力有限,这都为跨界世界自然遗产地管理带来挑战。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遗产地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但部分跨界世界自然遗产地多次在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审议,有关工程建设、旅游活动等威胁因素一直受到国际世界的密切关注。

#### 瓦登海遗产地跨界保护管理案例分析

欧洲北海是个陆架浅海水域,平均水深90m,面积75万km<sup>2</sup>。瓦登海是欧洲北海海域东南部的一个近岸海域,总面积约为1.5万km<sup>2</sup>,海岸线穿越德国、荷兰和丹麦3个国家,绵长1500km。2009年,瓦登海(德国和荷兰部分)以符合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瓦登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未被破坏的潮间带,拥有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瓦登海遗产地由荷兰瓦登海保护区及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瓦登海国家公园组成。2014年,为增强瓦登海区域的完整保护,德国下萨克森州国家公园向外围进行了扩展,丹麦的瓦登海自然和野生动物保护区也成为世界遗产地,瓦登海世界遗产地正式成为跨越德国、荷兰、丹麦三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除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外,瓦登海还位于欧盟“自然2000网络”“特别敏感海域”“拉姆萨尔湿地”等国际保护机制的管理范围内,一系列国际层面的协定、公约等对瓦登海管理都有一定的影响,包括欧盟指令如《鸟类及栖息地指令》、《海洋战略框架指令》,以及国际公约如《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等。基于这些国际层面要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三国通过定期召开三边会议、设立共同秘书处、决策机构和咨询机构,以及建设用于三边合作的实体办公中心等措施,逐步推进三边合作,以达到保护瓦登海世界遗产的共同目标。

召开瓦登海会议。1978年,德国、荷兰、丹麦三方举办了第一届瓦登海会议,决定加强三方合作,共同保护瓦登海,标志着三边合作机制的初步建立。1982年,在第三届瓦登海会议上,三国共同签署了保护瓦登海联合宣言,作为三边合作的国际协议,按照生态实体的形式保护瓦登海,提出了管理体制的组织架构要求和运作

要求。瓦登海会议每3年举行一次,会上审查瓦登海相关规划、报告三边合作进展。会议向涉及三边合作的所有核心利益相关方开放,包括科学家、政策制定者、资源使用者和自然保护人士等。

建立决策机构。三国之间建立了两级决策机构:第一个层级是三边瓦登海政府议会;第二个层级是瓦登海委员会。三边瓦登海政府议会是国家部委层面政府间合作的行政责任主体,主要职能是许可并监督合作,保障国际间政策的制定、协调与决策。瓦登海委员会是三边合作的管理主体,负责准备、采纳和实施三边瓦登海合作战略,监督执行机构和咨询机构,并维护与核心利益相关方的关系。瓦登海委员会包括13位成员,每个国家分别任命4位政府官员,委员会主席由每个国家轮流担任。

成立共同秘书处。三国政府于1987年成立了共同秘书处,秘书处受瓦登海委员会监督,为委员会和议会提供支撑,实施秘书处工作计划,支持科学研究网络与项目、信息交流和财务管理。秘书处成立以三国签订的行政协定为基础,由丹麦环境部、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与核安全部及荷兰经济事务部共同签署,每个部委分别出资三分之一作为秘书处经费。在这一框架下,秘书处通过质量状况报告和三方监测与评估项目搜集和汇总科学研究成果。

设立咨询机构。咨询机构为议会和委员会提供服务。首先,委员会任命咨询专家(4名),可直接参与委员会会议。其次,委员会根据特殊任务与项目要求,任命任务小组(目前有5个任务小组)。此外,还成立了专家小组开展专项科学研究。任务小组的组建主要是政策导向,而专家小组的组建则是技术导向。在第9届瓦登海会议(2001年)之后,瓦登海论坛于2002年设立,作为瓦登海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咨询机构。论坛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较为独立的合作平台,自2011年之后定位为非营利协会。

建设实体办公场所。新规划的瓦登海三边世界遗产合作中心,计划新建于距离瓦登海最近的德国小镇威廉港,合作中心总面积为2900平方米,具有行政办公、会议以及游览等功能,将由三国共同使用。实体办公场所的设立将使瓦登海三边合作更为便利,更好地达到保护瓦登海世界遗产的共同目标。

多年来,三国通过三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和一系列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制定保护政策、编制和实施瓦登海相关规划、定期发布质量状况报告,以及持续开展三方监测与评估项目等,共同保护和维持了瓦登海生态系统和

景观的自然演化过程及其可持续性。瓦登海三边合作机制在瓦登海保护和管理方面取得的成就受到国际世界的认可，瓦登海三边合作模式也成为跨界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典范。

#### 我国跨界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机制建立策略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将跨界遗产申报列入优先申报遗产类型列表，反映了国际上对大面积保护地整体保护和跨界合作保护的倡导。但跨界遗产地意味着更高的管理要求。我国目前虽已初步建立了跨界遗产地管理体制，但远不够成熟，有关体制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也较为有限。提升我国在跨界遗产方面的保护管理能力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的承诺，建立健全跨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机制体制将有助于统筹保护、减少威胁，也将有助于我国持续开展世界遗产项目申报。瓦登海三边合作机制为完善我国跨界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体制提供了以下启示和借鉴：

(1) 各遗产地及所在行政单元之间形成共识。跨界遗产地的合作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和努力，这就需要达成统一的目标、制定统一的规划、实施统一的策略、开展统一的管理、科研、项目实施等工作。瓦登海通过形成联合宣言，制定规划和报告，明确目标、策略和具体路径，这是统筹遗产地保护管理的基础。

(2) 在不同尺度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独立与合作管理并举。跨界遗产地在管理中会遇到多种复杂问题，挑战也出现在不同的尺度上，只有当管理体制与问题的空间尺度相适应，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瓦登海在国家之间通过建立两层级委员会决策制度协调国际战略和相关利益；在具体管理上仍依托各国的保护管理体制和相关国家公园。这反映了在实际管理中，有些问题适合在地方层面解决，有些则需要更在更广的区域内协调，综合衡量协作成本及效益，才能确定在哪一层级解决问题更为合理。对照我国的情况，建议跨省遗产地在国家层面建立管理协调机构，而省内跨地州市遗产地则需在本省建立相应管理协调机制/机构，并明确相应事权和责任。

(3) 划定清晰的责任范围边界。跨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工作往往涉及管理、协调、研究、咨询等不同类型的工作，如瓦登海三边合作中，其根据任务分工设立了决策机构、咨询机构以及三边合作共同秘书处，通过清晰界定各自责任范围，并推行开放、透明和广泛知情的管理过程，使不同机构之间既互相监督，又互相促进。

(4) 发挥国家和省级机构的支持和监管作用。履行世界遗产保护责任是一国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国家在世界遗产地，尤其是跨界遗产地保护管理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瓦登海三边合作机制是在三国共同努力下建立的，并且三国的有关部门共同出资建立了秘书处，并开展监测、评估和科研项目。我国虽然没有跨国界的自然遗产地，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强化了下级政府对上负责和国家对地方的干预和约束能力，相比之下，同级政府之间自发形成共谋共治的动力不足，因此跨省级和跨地州市的遗产地更加需要国家、省级层面建立相关机制/机构予以指导和约束。四川、新疆等省级世界遗产管理部门的建立和条例的制定正是此类探索。

(5) 持续开展科学研究和监测项目。相比于非跨界遗产地，针对跨界遗产地持续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和监测项目更为重要，特别当在合作管理过程中遇到冲突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时，科学研究和监测结果往往可以为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强有力支撑。同时，通过管理有效性的监测还能够对管理进行反馈，有针对性地提升跨界遗产地保护管理的有效性。

(6) 根据实际把握体制建立的核心要素。跨界管理没有固定唯一的模型，并不能生搬硬套。但通过瓦登海三边合作机制的研究和分析仍可以归纳出一些制度设计的核心要素，包括管理框架、功能与范围、权力清单、立法保障、决策机制、公众参与、资金支持方案、建立实体办公机构等，这些内容对我国建立跨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机制具有参考意义。

(2019年5期 遗产保护与研究)

(上接第8页)

客反映最为强烈的配套设施建设，比如卫生间、休息室等，以提高景区的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

#### 三、结语

世界自然遗产作为大自然留给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人们在对其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要注意做好保护工

作。特别是在当前旅游经济持续发展、自然遗产旅游景区人数不断增加的今天，更要加强景区的管理工作。针对当前自然遗产旅游景区在管理体制、遗产保护等环节存在的问题，相关管理者要采取好有效的应对措施。

(2018年10期 旅游纵览·行业版)



#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 旅游景区的管理问题与对策

世界自然遗产作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有着很好的科研、生态价值，也是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当前，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均成为著名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国内外大量游客，但在景区的管理中却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包括多头管理问题突出、人为破坏现象严重、旅游负担日益加大和配套服务建设滞后，文章基于此，就如何化解此类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世界遗产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根据遗产的形态，世界遗产有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以及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四种基本类型。自然遗产入选标准主要是看其是否具有自然生物学、地质学等层面的价值，自然遗产均为有着科学以及重要保护价值的地区。我国作为国土面积世界第三的大国，境内世界自然遗产数量位居全球首位，截止到2018年已有13处。自然遗产因其地形地貌、生物群落、自然景观的独特性，有着很高的旅游价值，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均为著名旅游景区，且不少属于国家旅游局认证的五A级景区，如武陵源景区、三清山景区、黄龙景区等。旅游经济的发展为国人更好地了解境内世界自然遗产提供了便利，但景区管理中的问题同样不容小觑，尤其是旅游负荷过重、

人为损害等，不仅对自然遗产的永久保护带来了负面影响，也不利于自然遗产的可持续开发。

## 一、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旅游景区管理中的问题

### （一）多头管理问题突出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旅游景区采取的是属地管理原则，由遗产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管理，遗产管理者的任命、财务管理权以及资源管辖权均由地方政府负责，比如四川九寨沟自然遗产设有九寨沟管理局，为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旅游景区存在着多头管理的现象，自然遗产旅游景区各类管理任务分别对应不同的职能部门，各部门均形成了一套由上而下的垂直管理系统，负责不同管理任务的业务指导。在中央层面，国务院虽然明确将自然遗产的管理职责划归给住建部，但多个中央部委均对自然遗产有一定的管理之权，比如财政部、教育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林业局乃至文物局等，这虽然是处于对口管理的需要，但在实际的管理中，却容易导致出现效率低下乃至管理不到位的现象。多头管理致使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管理权限交叉融合，增加了政出多门、推诿扯皮的风险。

### （二）人为破坏现象严重

世界自然遗产是大自然留给中华儿女的宝贵财富，不仅有着极高审美价值，也有深厚的科研、生态、社会和经济价值，需要被永久地保护。然而，在当前的世界自然遗产旅游景区的管理中，却存在着人为破坏的现象，这一行为给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人为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首先，建设性破坏。世界自然遗产与旅游经济的融合为遗产经济价值的发挥提供了条件，但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存在着管理不严格，资源破坏严重的现象，给遗产的保护带来了新的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在自然遗产内部违规修建各种交通、住宿、商业设施。其次，修复性破坏。世界自然遗产旅游

经济的融合为遗产经济价值的发挥提供了条件，但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存在着管理不严格，资源破坏严重的现象，给遗产的保护带来了新的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在自然遗产内部违规修建各种交通、住宿、商业设施。其次，修复性破坏。世界自然遗产旅游景区内的各项景点，尤其是人文景点，在长期的发展中出现了损毁、坍塌等现象，修复工作需要坚持“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但在实际的修复过程中出现了违规修复的现象，导致修复景点与原有环境不协调，比如，上饶市三清山旅游业发展集团擅自在三清宫建设控制地带内实施东西厢房复原重建工程。

### （三）旅游负担日益加大

世界自然遗产旅游景区因其风光秀美、景色宜人，深受国内外游客的青睐。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旅游经济，推动住宿、娱乐、餐饮和文化等行业的发展，积极利用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打造区域旅游名片。但旅游经济在发展中却由于管理不到位，出现了负担过重的现象，给旅游景区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世界自然遗产旅游景区每日的游客承载量有一定的限制，超出此一限制便会给景区管理以及保护带来风险，从而对世界自然遗产的文化以及生态平衡造成破坏。然而，当前世界遗产旅游景区“超负荷”运营已成常态，特别是在小长假、黄金周期间，游客摩肩接踵的现象极为常见，以四川九寨沟景区为例，2017年7月以来，入沟人数连续5天超过12 000人，给景区生态人文环境带来巨大负担。旅游过度开发、游客数量激增都加剧了游客管理难度，游客不文明现象得不到有效的制止，破坏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古墙砖面被涂抹刻画等。

### （四）配套服务建设滞后

世界自然遗产旅游景区是我国旅游行业的重点景区，每年均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因此，做好配套服务的建设就成为景区更好地服务游客的客观需要。但当前自然遗产旅游景区在管理中存在着过度开发与配套服务建设不足的双重问题。一方面，大量华而不实，对自然遗产保护有害的项目大量上马，另一方面，与游客切身利益相关的配套服务建设却长期停滞不前，严重影响了游客的观感与满意度，这对于景区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以最为基础的卫生间为例，自然遗产旅游景区面积通常很大，卫生间数量稀少，且分布不均，难以满足游客的需要。而其他体现旅游景区人文关怀的配套服务要么处于空白状态，要么名不副实，比如母婴室、医疗

救助站、矛盾仲裁处等，给游客的旅游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 二、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旅游景区管理对策

### （一）理顺管理体制

现阶段我国自然遗产旅游景区在管理中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给管理活动的深入开展增加了难度。相比之下，美国作为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排名第二的国家，在自然遗产的管理方面有很多可借鉴之处。美国世界自然遗产采用的是垂直管理与单一管理模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国家公园实行垂直管理，由联邦政府负责，其他自然遗产由内政部下设的公园管理局负责，其他机构没有管理权限。我国需要依托国情，建设世界自然遗产统一管理机构，理顺管理体制。

### （二）加强遗产保护

世界自然遗产旅游价值的开发，必须以遗产的保护、传承为前提，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显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国家要加强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全面防范遗产开发中出现的人为破坏现象。对此，一方面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推进以世界遗产保护为主题的《世界遗产保护法》的立法工作，将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作为法律建设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要构建遗产保护预警机制，将事后的惩处前置为事前的预防，降低人为破坏对自然遗产的影响。

### （三）合理发展旅游

世界自然遗产不仅是遗产所在地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因而，在旅游开发中，必须注意合理开发、科学开发，避免出现杀鸡取卵式的开发。合理发展旅游经济，需要将景区做好游客的限流工作，根据景区生态保护的实际需要，对游客进行限流，确保游客不成为景区管理的负担。同时，景区要加强游客的管理，针对游客在观赏中出现的不文明行为乃至违法行为，要及时纠正，必要时报送公安机关，从而彻底改善景区的旅游生态。

### （四）优化配套服务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旅游业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但在游客数量增加以及旅游收入增长的同时，旅游业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尤其是在游客服务中，更是如此。配套服务的欠缺对游客旅游体验以及满意度均有重要影响。因此，世界自然遗产旅游景区要秉持人文化的旅游发展理念，在不损害自然遗产的前提下，加强各项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尤其是游

（下接第6页）



#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 旅游开发模式

桂林是我国典型的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不仅是峰丛喀斯特地貌和峰林喀斯特地貌演化的独特呈现，也是全球塔状喀斯特的代表地，保留了从岛状峰丛、连体峰林到孤立峰林连续演化的景观，以及峰林片区不同高度的地下河脚洞、峰丛片区的竖井状洞穴。另外，其独有的生态环境还孕育了类型多样的生物种群，这些生物种群构成了独特的喀斯特岩溶生态系统，具有重大的科研、科普价值。2012年，《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以生态低碳的方式发展桂林旅游产业，将桂林建设成为生态科普旅游发展成熟、经济与旅游资源协调发展、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国际旅游胜地。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资源丰富独特，对其进行生态科普旅游开发，不仅可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开展科考、学习、交流，为遗产地保护筹集大量的资金，推动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持续发展。还可进一步提升桂林旅游品牌知名度，促进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的建设。然而，当前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态科普旅游开发不够系统、开发方式较为单一，旅游开发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产品层次较低且同质性较高，现有的生态科普旅游产品难以在同类型产品中彰显特色，也未能较好地与其他热点旅游景点或品牌性旅游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难以满足游客差异化的生态科普旅游需求。鉴于此，文章基于生态学理论、体验经济理论，对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开发模式进行探讨。

## 一、生态科普旅游开发模式的理论基础

### (1) 生态学理论

协调与平衡旅游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生态学理论的主要目的之一，其主要由生态伦理、生态系统、生态工程及景观生态学等理论构成。其中生态伦理从生态的道德关系角度强调人与动物、植物、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倡对自然环境的关注。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之内，由生物群落及其环境组成的

一个整体，系统中各成员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及相互影响，同时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结构与功能，均处于互相适应的协调变化之中。生态工程学是运用生态学知识，在促进自然界良性循环的前提下，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最大发挥资源潜力，防止与减少生态环境污染，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同步发展的理论。景观生态学包括两方面：一是地理学的景观；二是生物学的景观。国际景观生态学会提出的景观生态学概念是指对不同尺度上景观空间变化的研究，包括景观特性、生物因素、地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分析。简言之，景观生态学理论认为景观的空间结构与形态特征会对生态环境中的生物活动和人类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世界上最美观的景观之一，同时也是地球上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之一，其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土层极薄、地表容易漏水、成土速率慢以及植被破坏难以恢复等方面，对其开展旅游开发则需严格遵循生态学理论，同时也只有以生态学原理为开发指南，通过生态设计、生态补偿与生态管理等手段，才能真正实现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与开发的双赢。

### (2) 体验经济理论

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体验经济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其发展至今，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派恩二世和吉尔摩在1998年提出体验经济的内涵：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在消费者参与的活动过程中，创造出美好的体验使消费者记忆深刻，进而形成难忘的回忆体验，从而使消费者想要为此类活动付费。体验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旅游开发活动要求具有参与性、互动性、同步性以及个性化等特点。自然遗产类景观相较于其他景观普遍存在游客感知度低、互动性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是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与游客寻求体验的内在需求出现脱节，使得旅游开发呈现出很有说头，只有看头，很没玩头的自然遗产类景

观常态。随着旅游活动普及，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已不再满足传统观光式旅游，不局限于听故事传说，他们更想通过有趣的旅游活动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而现有科普模式多缺乏趣味性、互动性与体验性。文章将体验式旅游需求为核心，以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为舞台，以生态科普旅游产品为道具，以引导游客参与体验为目标，进行旨在为游客创造深刻记忆的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 二、生态科普旅游开发模式的原则

### (1) 保护优先原则

自然遗产地旅游资源的脆弱性和敏感性要求旅游开发设计必须遵循保护优先的开发原则。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在旅游开发活动中会不同程度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并且一些影响对遗产地生态环境具有不可逆转性。因此，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开发中必须遵循保护优先原则，在建立和完善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提名地及缓冲区保护措施的基础之上，再对可开发区域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行为，开发的同时要优先建立可开发区域的保护体系，据此确定不同区域的旅游开发等级，充分使用符合当地自然环境的景观建筑设计，以保护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珍稀的野生动物资源、典型的生态环境系统、特殊的自然景观以及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地质地貌。

### (2) 市场导向原则

满足游客需求是旅游产品开发的基本要求，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区别于其他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开发，使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产品独树一帜，这不仅需要挖掘当地特色，更需要以游客市场为导向。在进行生态科普旅游开发前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与预测，针对不同客源地、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细分市场的游客需求，结合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资源的特色，通过确定特色主题，策划项目活动，设计旅游线路等过程将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加工组合出具有多元化、多功能的复合型生态科普旅游产品，以满足游客多样化的内在需求，创造更多的旅游经济效益。

### (3) 体验性原则

体验经济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旅游活动中的舒适性和娱乐性，简单的观光游览活动已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游客更多要求产品的多样化以及服务的个性化，旅游需求结构中情感需求比重逐渐增加。自然遗产地类景区相较于其他旅游景区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但仍存在游客融入性差、感知程度低、互动性不足等问题。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开发中尤其要

注意体验性原则，做到以游客体验式旅游需求为核心，开发设计充满教育性、创新性、趣味性、体验性为一体的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引导游客深入参与，为游客创造难忘回忆的旅游体验，真正做到旅游活动的寓教于乐。

## 三、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开发模式

目前，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内有阳朔国家森林公园、雁山国家植物园、大圩古东瀑布、湿地公园等旅游景点，但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内容较少、产品体系较为单一，旅游形式仍以观光游览为主，缺乏创新性、体验性与参与性。同时现有的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对喀斯特地区独有的地质环境、生态环境特色未充分挖掘。为此，文章结合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开发现状，借鉴生态学理论和体验经济理论构建生态科普旅游开发模式，探讨如何在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景观的空间结构与形态特征的影响下，以生态科普旅游服务为舞台，以生态科普旅游产品为道具，引导游客参与体验，形成美好而记忆深刻的生态科普旅游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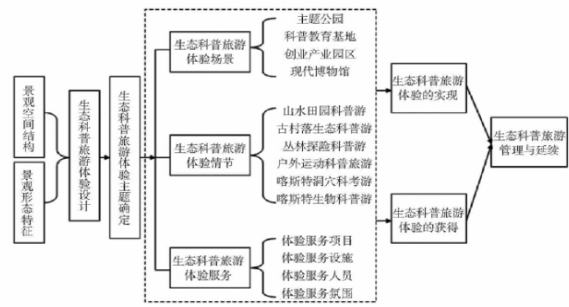


图1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开发模式图

由图所示，该模式图反映了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的体验设计、体验主题、体验场景、体验情节、体验服务、体验实现与获得等，展示了生态科普旅游在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景观空间结构和景观形态特征影响下具体的开发过程。可见，在不同的生态科普旅游体验场景中，游客参与形式多样的体验情节，通过与体验服务项目、体验服务设施、体验服务人员、体验服务氛围间的互动，而产生不同的体验。该模式不仅强调了生态科普旅游的实现与获得，还侧重于对生态科普旅游各要素的管理，以便于对其展开延续发展，而非局限于现有的生态科普旅游活动。

景观空间结构和景观形态特征是指根据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和开发利用要求，去规划在空间上的结构布局，主要体现为“一轴两带，双翼七区”的空间结构特征：1、一轴，遗产地的核心发展

轴,指遗产地从北到南的中轴线,贯穿大圩、草坪、杨堤、兴坪、葡萄等地到阳朔县城。2、两带,遗产地内漓江水系游览带(桂林雁山区到阳朔县,是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最核心的区域)、桂阳公路(G321)生态休闲带(以桂阳公路为轴线,从雁山、大埠、葡萄、白沙一直到高田这一带的喀斯特峰林平原,属于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开发的优势地区)。3、双翼,生态休闲科普旅游发展翼(遗产地东侧,包括大部分以杨堤为中心的遗产地核心区域,以开发生态观光、休闲度假等旅游为主,目的是在休闲度假中普及喀斯特地质地貌相关知识)、专项科普探索旅游发展翼(遗产地西侧,包括大部分以葡萄为中心的遗产地缓冲区域,以开发丛林探险、科普探索等旅游为主,以达到使游客在创意体验项目中获得科学知识)。4、七区,根据资源特色及分布,分为七大功能区,分别为喀斯特山水观光休闲区、喀斯特人文景观休闲区、喀斯特户外运动体验区、喀斯特生态农业度假区、喀斯特科普知识学习区、喀斯特文化创意产业区、综合旅游服务区。

体验场景是指呈现体验主题与主题有关的所有景物,即主题体现所处的活动场所,桂林喀斯特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场景的设计,不仅是一种体验景观的呈现,而且可以为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浓郁的生态科普环境氛围,配合游客生态科普旅游行为的进行,较好地增强了旅游活动的真实感。结合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景观特征及其开发现状,文章提出了以下几种体验场景:

### 1、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是以游乐为目的的仿真环境塑造,特点是将主题融入游乐园中,游乐内容与形式围绕既定的主题展开设计,园内所有建筑物的色彩造型和植物外形都为主题服务,构成游客容易辨认的游园线索。主题乐园具有陈列展示、影视体验、参与互动等多种产品形态,包括静态展示、观光游览、动态表演、休闲娱乐等多元化的产品体系,可以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旅游需求。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地质地貌丰富多样、文化底蕴深厚,尤其是在大埠、白沙等户外运动体验区具备了主题公园模式开发的必要条件。合理运用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资源中自然和人文两大类的精华,经过创新设计旅游项目和精心包装向游客推广,凭借其对生态环境的真实再现,对地质知识和历史人文的浓缩,不仅具有很强的娱乐休闲功能,还能寓教于乐,实现生态、地理等科学知识的普及。具体可围绕“喀斯特”为主题,以“地壳运动”“喀斯特地质演变”“地质古生物化石”“地质遗迹”等为模板单元,设计地壳运动的5D动感电影,

古生物再现VR虚拟幻境,地壳运动模拟等趣味性、参与性十足的旅游活动项目,来构建集休闲、体验、科普、探险功能为一体的地质主题公园。

### 2、科普教育基地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具有世界自然科学和美学价值,同时其大量的地质和生态环境相关的科学知识值得向公众普及。为实现公共科学知识的共享,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国家也鼓励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科普教育基地模式来开发科普旅游。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可在葡萄镇和桥头铺等科普知识学习区通过建立喀斯特科普教育基地的模式开发生态科普旅游。一方面,可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相关地质、生态科研组织或协会进行深入合作,科研院校和组织具有从事生态科普的智力优势,对遗产地的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了解得更为详细,有助于更科学合理地开发对遗产地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另一方面,科研基地模式有助于将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定向针对性地推广给目标客源群体,并通过国内外的科学研讨会、科普知识讲座等交流平台进行精准营销推广。同时,可建立动态的遗产地地质系统、生态系统模型或影视作品,重点展示地壳运动、地质演化、喀斯特地貌发育等价值高、趣味性强、具有技术含量的科学项目,并可由此开发系列科考研修旅游产品,吸引具有国外高消费能力的游客群体。

### 3、创意产业园区

创意产业是指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来源于人的创造力和聪明智慧,并通过科技的支撑作用和市场化运作可以被产业化的活动的综合。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态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在葡萄镇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通过创意产业园区开发模式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业遗址、轻工业和生态农业,创造设计出游客所需或感兴趣的旅游项目。还可采用创意产业园的形式对遗产地农副产品与民间技能进行标准化生产或创意性转化,使之保有遗产地本土文化色彩的同时又能满足旅游商品市场需求,以达到创意产品化、产业融合化的目的。这里所说的产业园不仅具有生产创造功能,还应具有旅游功能。因此,创意产业园的设计应充分考虑旅游需求,其建筑形式、景观设计都要具有喀斯特地貌的特色、生态景观的特色,并开放部分生产车间或创作室供游客参观游览,还可将现代娱乐设施、休闲项目等纳入其中,将产业园打造成一个集文化深度体验、特色餐饮、休闲、娱乐、观景、购物等于一体的综合旅游园区,既可以实现园区创收,又能展现地方文化活力,是促进遗产地生态农业、轻工业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开发模式。



#### 4、现代博物馆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具有向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功能。现代博物馆与其不同之处在于展示方式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陈列摆放,而是采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声、光、电等高科技设施以及先进的穿戴体验设备将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更生动直观地展示给普通大众,同时举行充满趣味性和探索性的科学活动,吸引游客参与。集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为一体的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因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严格保护要求,致使普通游客无法近距离探索观察喀斯特地貌,因此可在葡萄镇、雁山区等地的科普知识学习区采用现代博物馆模式,可通过引进高科技VR虚拟仿真技术、5D仿真感触技术再现桂林喀斯特地貌演变过程,满足游客零距离欣赏自然遗产地的需求。同时举行游客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亲手制作喀斯特各种地貌类型的模型、微缩景观等体验式活动,打造全国首家自然遗产地真人互动式高科技体验中心。在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的体验情节主要是指参与性生态科普活动项目、常设和临时的表演性活动项目、及饮食、住宿、游览、娱乐等功能性服务环节。文章结合前文的综合分析及相关理论的指导,提出了以下几种体验情节:

(1) 山水田园科普游。合理开发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鬼斧神工的峰林、相映成趣的山水、葱郁生态的山野、散落田园的“乡愁”小村等资源,在主题乐园开发模式主导下,可通过山水+村落文化知识、山水+田园种植技术、山水+古诗词文化知识、山水+地质科普知识等创意融合式旅游开发来体现桂林喀斯特山水田园科普旅游产品的创意和个性,通过水陆空等不同游玩形式的创新来突显喀斯特山水田园科普旅游产品的趣味性。

(2) 古村落生态科普游。依托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优美的乡村田园风光,把握美丽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建设的契机,借助规划区良好的区位条件,对规划区村落,以及闲置、废弃的民居进行改造建设,以原住民、原住房、原生活、原生产为开发对象,可建设以原生态为主题的乐园或以古村落为核心的生态博物馆,开发以游居、野行、修学为特色的喀斯特古村落生态科普旅游产品。

(3) 丛林探险科普游。设计以“丛林探险”为主题的生态科普旅游体验产品,使游客学习丛林谋生技能,了解丛林野外生存知识,培养锻炼独立生存技能,在探险科普旅游活动中介绍野营生火技巧、野外生存技能、

越野线路规划、急救知识等内容。使游客在丛林探险科普旅游中不仅能探索自然奥秘,还能掌握户外远足的必要科学知识和安全技能。

(4) 户外运动科普旅游。与国内专业的驴友俱乐部和户外运动机构合作,完善户外旅游的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措施,举办喀斯特遗产地户外马拉松、自然遗产地山地骑行等户外运动赛事,定期开展普及山地户外运动相关科学知识的骑行、徒步、登山绿道和天然露营地等旅游活动,将自然遗产地建设成桂林热点户外运动科普旅游目的地。

(5) 喀斯特洞穴科考游。以洞穴探索为主题,对遗产地内许多未被发现和未被开发的地下洞穴,如莲花岩、冠岩地下河洞穴系统、光明山大岩、碧莲洞、穿山岩、阳朔来仙洞、聚龙潭、瞻鹤洞等进行探索发现,同时举办类似于洞穴旅游科考节的科考活动,与国内外顶尖洞穴探险专家、专业探险机构和户外团体合作开发安全但刺激、趣味的洞穴科考旅游产品,以吸引广大青少年和青年群体。

(6) 喀斯特生物科普游。生物科普旅游是生态科普旅游开发最普遍的旅游产品,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建有多个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拥有大量丰富的珍稀植物和野生动物资源。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可借鉴现代博物馆开发模式和科研基地的体验场景,以现有的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为核心,开发植物和动物科普旅游产品,向公众展示遗产地动植物在维护遗产地生态平衡、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功能,以及了解动植物分布特征和生活习性,增加游客的科普知识。

#### 四、结语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开发不仅迎合了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发展的需求,而且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和可持续开发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其现有开发模式存在诸多不足,在对其进行综合探析后,文章在生态学理论、体验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提出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开发构建的保护优先原则、市场导向原则和体验性原则,进而阐明了生态科普旅游开发模式,“一轴两带,双翼七区”的景观空间结构和景观形态特征;主题公园、科普教育基地、创意产业园区、现代博物馆等生态科普旅游体验场景,山水田园科普游、古村落生态科普游、丛林探险科普游、户外运动科普游、喀斯特洞穴科考游、喀斯特生物科普游等生态科普旅游体验情节。

(2019年1期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可可西里：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科学保护之路

2017年7月7日，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青海可可西里经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同意，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12个，同时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第一个荒野景观世界自然遗产，以及青藏高原上的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

## “申遗”，价值的独特性被世界认可

十多年前，时任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的才嘎在参加青海省两会时，建议将可可西里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那时，才嘎坚定地认为，可可西里既具有独特的地貌特征，又有尚未为世人所熟知的独特自然景观，更是独有的珍稀和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符合“申遗”条件。

可直到2014年底，可可西里才正式踏上“申遗”之路。2014年10月15日，青海省政府召开了“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正式启动青海省可可西里申报世界遗产工作。根据申报地周边交通、输油气管道、输电及通讯线路、建筑设施以及可可西里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各保护站内建筑现状，青海省确定了整治内容，提出了工作方案。

2015年，青海省连续四次组织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等单位对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和缓冲区范围、面积、界线、动物资源本底、环境综合整治、环境因子监测站点及社区保护等情况进行现场调查，为“申遗”文本和保护管理规划编制工作获取了详实的科学资料。



2016年10月，世界自然遗产评估机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委托专家对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开展了为期10天的现场考察评估，这是对可可西里申遗的一次大考。同年12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遗产项目组召开会议，对申报文本评审、现场考察评估和外围其他专家的意见进行了讨论，于2017年1月3日来信，对青海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有待补充和完善的材料提出了要求，并邀请青海省代表团访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部，面对面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按照来信意见，青海省迅速组织编织了青海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补充材料，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遗产中心代表团同时成立。2017年2月20日，代表团赴瑞士格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部，拜会世界遗产项目组组长提姆·巴德曼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行动官员。代表团逐条对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补充材料进行了说明，对藏族群众对野生动物及生态环境保护传统做了进一步阐述。提姆·巴德曼肯定了代表团所作的说明，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在全人类遗产保护中做出的贡献，并就青藏公路昆仑山口至沱沱河段沿线缓冲区按照遗产提名地进行保护管理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2月21日，代表团约见了赴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现场考察评估专家卡洛，就拟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的补充材料具体答复内容进行了说明。卡洛·奥索拉高度评价了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遗产价值和保护管理水平，对青藏公路昆仑山口至沱沱河段藏羚羊等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保护管理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一边访问一边修改补充材料。提姆·巴德曼提出的意见建议具有国际视野，从世界遗产评估专家角度概括了各评估专家意见，符合青海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实际。代表团接受提姆·巴德曼的建议后，在出访途中进行了专门研究，再次修订完善了补充材料中文文本，由国内专家翻译、校对、排版后，于2月23日在法国巴黎完成英文文本打印工作，提交世界遗产中心综合处秘书，

按时完成了青海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补充材料的报送工作。

在可可西里入遗之前，青藏高原上没有世界自然遗产，我国也没有荒野景观的世界自然遗产。可可西里申遗小组组长、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认为，可可西里的价值独特性难以替代。所以，“申遗”团队紧扣可可西里最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东西，确定了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的两个标准：“无与伦比的自然现象或自然美景或审美价值”和“生物多样性和濒危物种”，充分展示了可可西里固有和独特的遗产价值。

魅力源自实力。可可西里申遗通过时，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两项关于世界自然遗产标准的认可：“可可西里面积广阔，几乎没有现代人类活动的冲击。极端的气候条件和它的难以接近性共同保护着这个最后的庇护所，它属于很多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高原依赖物种。三分之一以上在提名地内发现的高级植物为青藏高原所特有，所有靠这些植物生存的食草哺乳动物也同样是青藏高原特有。可可西里拥有非凡的自然美景，其美丽超出人类想象，在所有方面都令人叹为观止。”

根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可可西里满足世界遗产地以下两个标准：一、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绝佳的自然美景和美学价值的地区。可可西里拥有拥有世界罕见、独特的自然景观，庞大的山脉、险峻的冰川、多姿多彩的湖泊群及河流湿地非凡的自然美景，令人叹为观止，超乎想象。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腹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造就了全球高海拔地区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记载着地球演变的历史和生命进化的进程。二、是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和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遗产地植物区系高度的特有性，与高海拔和寒冷气候的特点结合，共同催生了同样高度特有的动物区系。包括74种脊椎动物，更保存了藏羚羊完整生命周期的栖息地和母藏羚羊长途迁徙后聚集产仔的景象，及其在三江源和可可西里间完整的迁徙路线，支撑着藏羚羊不受干扰的迁徙。

#### 没有终点的保护之旅

“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的一劳永逸。世界遗产地每年都要接受动态考核，必须在机制、科研、管理等方面达到极严格的世界标准，始终完好保存自然风貌。因此，这反而是开启了更加严格更加规范、永无终点的生态保护之旅。

“对任何国家或者人类来说，一块完整的、没有人活动的地方都是无价的样本。比如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

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分清到底是人为活动带来的影响，还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可可西里提供了一个参照样本，这样一个天然的对照，在地球上已经很少了。可可西里申遗的成功，将从更高的层面保护这片净土，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吕植如是说。她表示，《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等国际公约和法律，将在可可西里得到最严格的执行。

针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要求，青海省政府部门也做出诸多承诺：不在遗产地范围内为根除小型哺乳动物鼠兔采用毒杀行动；不强制安置或迁移遗产地缓冲区的传统牧民；不在任何时候许可或提倡遗产地内会威胁到动物迁徙路线的围栏活动……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苏建平说，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在青藏高原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人们通过保护可以更好地享受生物多样性带来的福利。在中科院地理所资源生态与生物资源研究室主任闵庆文看来，“申遗”成功对可可西里未来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从多学科的角度，将当地物种资源保护、生态系统保护、民族文化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做到保护与发展的协同提升，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然遗产保护的目标。”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给可可西里保护区的工作者带来极大鼓舞。巡山队员们坐进课堂、捧起书本，开始学习野生动植物分类、生态本底调查等基础知识。未来，他们既要当好可可西里的守护者，也要做好当地的生态观察员和宣讲员。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闻丞表示，青藏公路和铁路的修建对哺乳动物的迁徙和繁衍造成了一定的人为干扰。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是南北向并行穿越遗产地的两条交通走廊，而遗产地的有蹄类动物具有东西向季节迁徙的特性。在青藏公路楚玛尔河大桥至五道梁区间，是藏羚跨越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前往卓乃湖等地产羔的主要通道，繁忙的交通廊道对藏羚等动物的迁徙形成了阻碍。闻丞坦言，虽然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在与藏羚羊迁徙路线的交汇路段多用高架桥，留下迁徙通道，藏羚等野生动物也正逐渐适应交通廊道给环境所带来的新变化，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的运输量持续增加，特别是青藏公路过往车辆日趋增多，对动物的活动构成现实威胁。

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对原始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的正常繁衍也造成了一定威胁。同时，气候变化带来的气候和自然环境短时间快速波动给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闻丞认为，气候变化已经加速了遗产地冰川和冻土的融化速度，并导致遗产地内流湖湖



泊水位的剧烈变化。他举例说,2013年由于气温升高导致的水源补给增加,使得藏羚羊的核心产羔地卓乃湖湖岸溃坝,近三分之二面积的湖水外泄至下游。

遗产地面临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因此通过监测工作掌握遗产价值的变化和威胁因素的状况能为具体的保护工作及时调整提供必要的指导。青海省申报世界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在拟定的《青海可可西里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中,提出了建立在监测系统基础上的一系列管理措施,通过监测系统及时了解威胁的发展状况。同时,为构建协同保护大格局,可可西里还打破地域限制,与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等自然保护区建立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协同打击生态违法活动。

相邻的几大自然保护区借助这一协助联防保护机制,不定期互派人员,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和工作方法,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保护、管理、科研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使保护区野生动植物保护行动形成了强大合力。保护区相互间的协作对维护区域内部的生物多样性、珍稀动物的生活习性以及迁徙的连通性意义重大。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雷光春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对生态保护投入了大量资金,设立了众多自然保护区,但是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并未遏制。未来自然保护区应避免成为“生态孤岛”,各自为政的保护策略不再顺应保护区发展需要,自然保护区的协调发展也是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的趋势。

#### 借力科研支撑生态治理

2002年后,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苏建平团队开始了在青海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研究,至今已有16年的时间。针对藏羚羊的研究主要涉及种群数量、分布、食性、栖息地选择、迁徙追踪、种群遗传分化、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等等。

为完成给青海省申遗准备材料提供科技支撑的《可可西里地区生物资源考察报告》,苏建平同他所在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先后安排了5次野外考察,历时3个多月,完成了可可西里申遗地生物多样性调查和报告编撰工作。通过考察,科研人员在可可西里地区证实了赤狐、兔狲、豺等物种的存在。“比如赤狐,以前只是偶尔听说,正规的资料里没有相关信息,但这次补充调查拍到了照片和视频。”苏建平说。同时,通过野外调查采集植物样本进行鉴定,科研人员也对许多植物物种已有资料中的信息进行了纠正,共梳理出了可可西里地区29科89属200余种植物。其中变动比较大的是鹅观草属,考察后很多物种被归并到了披碱草属。

苏建平强调,可可西里不仅是包括藏羚羊在内的无

数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众多珍稀植物生长的乐土,但由于对青藏高原植被的研究相对不足,对很多植物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如何揭示植物适应高寒、干旱、强紫外线的环境,植物形态、生化如何适应这些环境,是否有相应变异基因挖掘?这些都是科研人员关注的重点。

可可西里的生态系统脆弱,植被生产力低,一旦放牧,特别容易退化,产生裸地、沙化。近年来,科研人员对高寒地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构建了针对整个系统的综合治理模式,包括对青藏高原草地的合理利用、天然草地改良乃至人工草地种植等措施,为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治理和恢复提供了技术支撑。

以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鼠害导致草场退化。苏建平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苏建平说,固有观念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大多数人,包括一些科研工作者,导致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随着人口增长,牛羊已严重超载。苏建平解释:“在正常情况下,草原鼠类的种群密度非常小。然而,随着牛羊数量激增,禾本科植物被啃食殆尽,宽叶杂草获得充裕阳光,长势良好。这样一来,鼠类由于食物变得充足,大量繁殖产生鼠害,进而破坏草场、导致土地沙化。”

苏建平花了15年时间进行科研论证,不仅改变了固有观念,而且提出了“用生态的办法治理生态的问题”,通过草畜平衡来保证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如果发现一个区域由于放牧强度比较高,藏羚羊因食物情况较差而不得不提早迁徙,或因为食物条件好延缓迁徙,我们就可以调节人类行为和放牧水平。”苏建平解释称。

2002年以后,由于全球变暖,青藏高原的气温出现了变化,有些地方升高,有些地方降低。苏建平说:“我们主要通过湖面高低来判断气温变化,湖面升高是气温升高引起地下冻土、冰川、雪山融化的结果。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近年来几个湖的水位都上升了,说明可可西里的气温也在上升。气温升高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干旱化加剧,另一个是因降水增加而变得湿润。”

苏建平认为,目前,生态修复措施很难在大的空间尺度上实施,一是因为耗资巨大,经济上难以承受;二是因为生态过程复杂,人工干预的有效性无法保证,通常只能在局部做一些有限的生态修复工程。他认为,可可西里最理想的状态是,既不人为破坏,也无需人为修复,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干扰越少越好。

(2018年06期 中国周刊)

# 日韩经贸纠纷解读

日韩贸易纷争愈演愈烈。为应对日本的出口管制举措，从大财团一把手赴日到诉诸世贸组织（WTO），从号召企业界“共度时艰”、构建“官民紧急体制”，到寻求美国支持与调解，韩国方面紧急动员，几乎考虑了“所有应对方案”。但目前来看，韩方的应对既软又空，难有实质效果，反而给外界以无计可施之感。日本制裁韩国，背后有多重动机，究其根源，甚至牵扯到两国之间的民族仇恨情绪，但日方的针对性操作确实扼住了韩国支柱产业咽喉。日本何以仅通过控制3种原材料就能让韩国坐立不安？



博弈：“自伤一百损敌一千”

“5 万亿对 1700 亿（韩元，100 韩元约合 0.6 元人民币）。”据韩国财经网站“MT”报道，这是日本此次限制对韩出口推定的韩日最大损失额。分析认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进行精密计算后，最终选择了这种“自伤一百损敌一千”的做法。有韩国半导体产业人士承认，如果日本继续强化管制，有可能导致两国相关产业“共灭”，但双方的直接损失显然不在一条水平线上。

正如汽车出口之于日本，半导体产品出口是韩国的支柱产业，三星、LG、SK 等是关系到韩国经济大局的重要制造企业。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统计，今年 1-5 月，韩国半导体出口总值高达 45.0294 万亿韩元。如果单纯比较日本对韩 3 种物资供货值和韩国半导体停产造成的损失的话，有可能达到 1:270 的比例。不仅如此，鉴于韩日半导体产业的竞争格局，有担忧的声音认为，日本有可能借断供动摇包括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韩国主要半导体企业的地位。

韩国经济发展依赖外国生产材料，由企业生产出中间品或成品之后再出口。这次被管制的 3 种材料，日本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七至九成，韩国则在半导体内存市场占有率高达五至七成。韩国中小企业团体前不久对 269 家半导体、液晶屏、通信设备和零部件等受日本出口限制影响明显的企业发起调查，发现近六成（59%）企业表示如果日本制裁长期化，那么很难坚持 6 个月以上。更关键的是，有 46.8% 的可能受影响企业并没有对策。这已经在韩国部分中小企业中造成恐慌。

此外，据称日本政府还在准备 100 项对韩出口限制清单。这绝非空口威胁。按照 2018 年的统计数据，韩国对日依赖度高的前 10 大物资分别是：半导体制造设备（占进口总量的 33.8%，价值 52.42 亿美元）、控制设备（11.7%，19.22 亿美元）、其他精密化学原料（15.2%，19 亿美元）、其他合成树脂（42.8%，16.34 亿美元）、废旧钢铁（61.4%，16.24 亿美元）、铁及非合金钢柔性钢板（64.8%，12.62 亿美元）、其他化学工业制品（30.9%，12.03 亿美元）、二甲苯（95.4%，10.85 亿美元）……

## 根源：“日本供应零部件、原材料，韩国制造成品”

日本供应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韩国制造成品——韩国自 1965 年与日本邦交正常化后，一直面临对日贸易逆差问题，累计已经高达 6046 亿美元，主要原因就是这种产业和贸易结构。

去年，韩国对日贸易逆差为 240.8 亿美元，按国别来看规模最大。具体来说，原材料、二甲苯、机械类产生 85.7 亿美元逆差，电机机器、录音设备、再生机械产生 43.3 亿美元逆差，而电子元器件制造机械、精密机械等产生 35.7 亿美元逆差。总的来看，半导体设备、电子元器件制造机械、电子机械控制设备等是导致对日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从日本的角度看，很容易理解。“欧洲人发明一个新事物，美国人将其商品化，英国人对其投资，法国人来做设计，日本人把它小型化，中国人将其廉价化”，这是在日本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说法。从这个分工可以看到主要国家在世界工业制造领域的位置，而制造业比较发达的韩国却不在这个链条上。确切地说，韩国贡献

有限，原因是没有专有和擅长的一面。

日本能拥有“小型化”专长，是因为二战后它一直在世界工业领域致力于一些高精尖技术的掌握和突破。日本有很多中小企业，有的企业甚至只有十几个人和几台机床，在大企业大量兼并小企业的形势下，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只能靠掌握“独门绝技”。而韩国在崛起阶段，靠模仿日本一度让后者在电子行业脸上无光，但这么多年过去，日本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韩国始终没有致力于找出自己的专长领域并长年投入。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发达经济研究室主任金圭判接受韩联社采访时也称，过去韩国依靠美日的资本及技术实现经济增长，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韩国政府推动提高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国产化率，但截至2010年，仅在汽车领域取得显著成果，原材料方面仍没有缩小与日本的技术差距。

“前有日本领先，后有中国追击，韩国材料产业或沦为三明治夹心”，这是韩国经济界不少专家的看法。材料领域需要长期的研发积累，而且技术壁垒很高，这是韩企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原因。当然，一旦开发成功，就能在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享受到“先发优势”。韩国LG化学和韩华L&C等在2013年曾试图推动由日本日东电工垄断的制作触摸显示屏面板必需的氧化铟锡切片国产化，但最后不得不放弃。

#### 逆转：日本重夺旗舰产业市场？

日本这次针对性制裁韩国半导体行业，还有一段被人忽视的“渊源”。美国彭博社称，韩国如今是世界头号存储芯片制造国，这一地位是从发达国家手中夺取的。首先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从美国手中夺取领军地位，然后是韩企在90年代异军突起，导致日企市场份额急剧下跌，只是韩企仍然依赖日本生产的特定工业化学品。鉴于此，尽管不少人认为日本此次是在报复两国外交争端，但日本领导人也有可能对韩企夺走日本的旗舰产业之一而恼火，并希望重新夺回其市场。

实际上，除了在存储芯片制造领域取得优异战果，韩国政府一直没忘记振兴材料产业。2013年11月，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发布“第三次材料零部件发展基本计划”，表示要在2020年前实现材料和零部件产业出口6500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2500亿美元，超越日本进入世界四强之列。为开发出世界水平的十大核心材料，韩国政府计划在2016年前进行1.7万亿韩元民间投资和3000亿韩元政府投资。

今年6月，韩国政府发布“2030制造业世界四强”规划，称将在2030年把现在排名世界第六的出口规模提

高到第四，把世界一流商品制造企业数量提升到现在的两倍（从573家到1200家）。韩国产业研究院认为，当前韩国制造业的附加价值率为25.5%，远达不到经合组织(OECD)30%的平均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韩国零部件、材料和设备的对外依存度高和技术竞争力恶化等。

这次面对日本的逼迫，按《日本经济新闻》的说法，日韩半导体产业界人士均认为，两国的技术差距很大，预计韩国企业短时间内很难从日本以外的地方采购到替代产品，但韩国可能会举政企之力推进国产化和替代采购。只是眼下，韩国或许只能忍耐，然后通过外交手段谈判解决，因为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此次摩擦的根源是“政治”。

一位长期在韩国交流的中国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制裁韩国有多重动机，对内有参议院选举等政治考虑，对外可理解为针对日韩间政治问题的经济报复。“在政治色彩上属于‘进步派’的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与保守派执政的日本一直‘八字不合’。前有特朗普做‘榜样’，安倍有样学样，想借经济手段来引发韩国国内政治冲突，分化韩国社会舆论，给文在寅政府施压。”果不其然，在日本公布制裁措施后，韩国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便对文在寅政府进行声讨，认为日本采取这一措施，责任在于韩国政府。这位学者说，从更深层次看，尽管有人（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把日韩比作“双胞胎兄弟”，但实际上，日本看韩国一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举个例子，1963年底，朴正熙就任总统，日本派出政坛元老大野伴睦作为特使赴韩。出发前，大野伴睦公开表示，他与朴正熙就像父子，能作为特使去参加儿子的就职典礼，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

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员卢昊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选择这个时机，是因为它认为当前形势对其有利，有美国的战略支持，与中国的关系持续改善，而韩国自去年以来经贸金融状况恶化。日本认为用贸易手段压制韩国可以更有效地击中其软肋，迫其低头，“它也试图借此展示它在贸易战方面具备针对特定国家‘精确打击’的能力”。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报道，今年4月，日本经济产业省成立新的专门部门，对日本拥有的高端技术的贸易管理开展调查，希望集中掌握日企及研究机构拥有的高端技术和产品信息，以及出口对象国是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和产品的。某种程度上，韩国成为日本类似举动服务于对外战略的实验对象。

(2019-7-14 凤凰国际智库)



# 城镇化的现实难题与潜在红利

到今天为止，中国已完成初步城镇化，下一步还将完成涉及数亿人口的现代城镇化进程。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化还会释放出巨大的需求。近几十年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结果是城市越发展，提出的目标和口号越高，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排斥性越强，城市门槛抬高了，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难度大幅度提升。原因在哪儿？



## 为何当前城市发展很难容纳巨量的农业转移人口

中央关于推进城镇化的态度明确，就是要解决农村人口向城市逐步转移的问题，通过城镇化率的提高，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强城镇经济的活力，拉动内需增长。而一些地方更多地是把目标对准城市建设和招商引资，重点是提高GDP增速，增加财政收入能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面貌，实现城市大变样。

按照中央的要求，应该努力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解决数亿农村人口的进城问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是要从解决稳定就业问题入手，逐步转化为定居；从就业城镇化过渡到生活和定居以及享受城市各项公共服务的全面城镇化。但是，我们要看到农民市民化进程要逐步地、缓慢地完成，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在各方面提出过高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推进城镇化，让数以亿计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需要在尊重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创造更符合进城农民就业和生存状况的城镇发展空间。

对于地方来说，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过程中，在向

发达国家看齐和赶超的心理驱使下，建设了无数个在面貌上几乎可以和发达国家城市相媲美的不同规模的城市。当城市的面貌发生变化、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大幅度提高时，城市管理者对城市的形象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也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城市包容性变差，因此，与大量农村人口进城的城镇化要求和远期目标不符。从现实看，几十年来地方管理者一任接一任的城市建设方式和对城市面貌的重视，已经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传统。这种传统发展方式的沿袭，实际上造成了城市空间很难容纳如此巨量的农业转移人口。

## 充分发挥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

如何确保中央提出的目标和地方城市具体的城市发展路径逐渐同步？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既有利益结构的调整，也有发展观念的转变，更有对国情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清醒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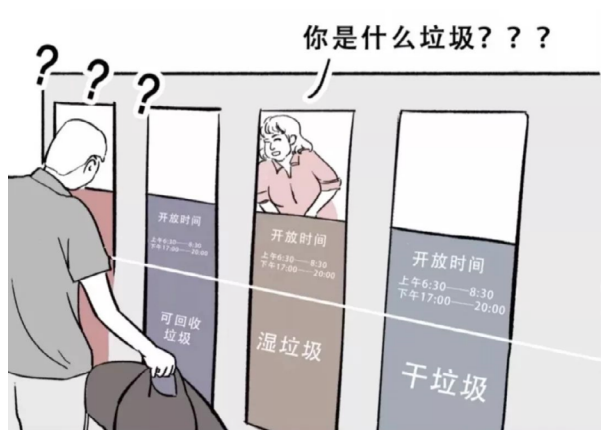
首先要搞清楚，我们面临的城镇化目标到底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转移农村人口，解决农村长期发展面临的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时，激发城市增长的活力，启动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带动内需的增长。我们要知道，当前2.8亿城市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和未来可增长的2亿多新增城镇化人口，他们的就业状况、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准等，与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的实际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如何发挥城市的优势，解决好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和居住问题以及各项公共服务问题，要切合他们的实际，要给予他们与收入和生活状况相对契合的城镇发展空间。另外，要创造和规划出进城农民的生活和就业空间，加大投入力度，解决他们在城镇的生活问题，使他们的根逐步落在城市，从农村彻底转移出来。还有，要发挥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作用，降低进城农民的生活成本和就业成本，通过不同规模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群，来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

从当前的经济形势看，解决城镇化的增长问题，重点是要降低重点城市的发展标准。已经发展得很好的城

（下接第20页）

# 垃圾分类，其实大有讲究

“依 zi 撒喇希”？这样的灵魂之问，据说正在成为上海的社交新话题。它的完整表述其实是：“你（扔的）是什么垃圾”；而其应用的场合，则是形成中的新社交中心——社区垃圾投放点。江湖头条，如今在魔都出街，不随身备个《生活垃圾分类指南》就难逃“智障”光环；宇宙传闻，过不了多久，一个新的“物种”——擅长垃圾分类的沪上百姓，将独领银河系风骚。



## 垃圾

站在垃圾分类的十字路口，会生出哪些迷思？最近，上海人民刨根究底的“天问”精神，没少引得全国同胞探头：提问，喝了一半的珍珠奶茶，属于什么垃圾？上海市民：简单！先把奶茶沥干净，把珍珠倒湿垃圾，把杯子扔干垃圾，再把杯盖放到可回收垃圾——没吃完的外卖同理。

连环提问，那尿不湿是干是湿？粽子和粽子叶如何明晰？包着狗屎的报纸怎么处理？一切食物残渣都是湿垃圾吗？这可难不倒精明的上海市民，莫急莫急，且听吾辈慢慢道来：水产固然是“湿”，它蛤蜊壳却是“干”；食材废料性属“湿”，粽子叶玉米叶则又作“干”；众人都说猪骨鸡骨都是骨，怎有人知鸡骨为“湿”，大棒骨唤“干”；至于您说那狗屎报纸，报纸“可回收”，

粑粑降于其上，便化作“干”。

一番讲述下来，见各外省人士仍如听天书，传说中能把大闸蟹吃完再拼起来的上海朋友，继续发挥解剖学家精神，推出简明垃圾分类教程——“猪四分论”。有朋友看上海人这回这么气吞万里、金戈铁马，不免生出疑问，“垃圾”如何命中了十里洋场的靶心？那就要怪你不解其中内情。2019年7月1日，上海市将正式实施“史上最严”垃圾条例——《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生活垃圾分类将成为法律强制要求。有多严？上海市生活垃圾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干垃圾、湿垃圾”四大种类；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如果进行混合投放或混合运输，最高可罚5万元。垃圾不分类，城市两行泪。哭诉过后，这里面其实大有讲究。

## 源头

作为垃圾，被处理的过程是怎样的？如果我们把消费产生的物流称为正向物流，垃圾处理就可说是逆向物流。它需要经历从生产者（物品使用者）到经销商（中转站和分选中心），再到消费者（各种终端处理设施）的运转过程。

这“逆向物流”的运输规模有多大？每年，要把全国人民生产的生活垃圾运到它们该去的地方，至少需要使用载重5吨的货车4000万辆（次）；单拿上海说，这座城12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能堆满一座东方明珠，23天堆满一座环球金融中心。为了清扫、运输、处理生活垃圾，全国每年还需拿出千亿以上的财政资金。而上海，以其市政府所在的黄浦区为例，2018年，该区常住人口约为66万，用于环境卫生的公共财政支出为15亿元，折合每年人均2300元。同样是垃圾，为什么上海的垃圾身后事如此“奢靡”？高昂成本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和越来越稀缺的处理能力之间的矛盾。目前，国内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主要是卫生填埋和焚烧，而这两个手段的处理能力都在接近饱和，北、上、广等大城市则全面超出负荷。

更何况，老传统就有“变废为宝”的说法。那些凝结了自然造化 and 人类劳动的物品，只在简单地使用后就被丢弃入填埋场或焚烧炉，在人均自然资源紧缺的中国，无疑是“逆天”浪费。垃圾分类的法子，正是为解如是困局。手段

见上海市民每天被“灵魂拷问”、如履薄冰；上海市废管处也第一时间站出，奉上分类简明办法：“可回收物记材质——玻，金，塑，纸，衣；有害垃圾记口诀——药（要）油（有）电灯；湿垃圾记原则——易腐烂，易粉碎；其余都是干垃圾！”这种分法的逻辑也很明确：分类是过程，减量是终点。今年起，上海开始正式实施强制分类，而北京的强制分类也在立法路上。“唯有了解，方能配合”——揣着这个本心，岛妹也对北京某区的垃圾处理体系进行了一次简单的走访。

先看“湿垃圾”的资源化处理。一辆标有“厨余垃圾”的半自动装卸垃圾车不紧不慢转过几个居民小区；满载厨余桶里的垃圾之后，驶入 20 公里外的某餐厨厨余资源化处理厂。厂内，餐厨和厨余垃圾由不同的垃圾车（队）回收，卸入不同的进料口预处理，之后则进入一套全封闭的处理系统。没过多久，岛妹手上即拿到了这套好氧处理系统的资源化产品，一种富含有机质的营养土。

至于上海，如今已有或在建闵行、老港、松江、金山、普陀等湿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你们吃过的每一只小龙虾，都将化作春泥更护花。可通过分类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还有可回收物。比如某商场保洁积攒的废纸箱，会被运输到再生资源集散中心进行打包；废铝罐、PET

饮料瓶、泡沫塑料等，都可使用机器进行压缩聚合成规则的形状。概而言之，如果湿垃圾得到资源化利用，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都去了该去的地方，那么剩下的其他垃圾（上海四分法称“干垃圾”）数量必然将大大减少，将它们送入焚烧发电厂和填埋场，处置它们的经济负担和环境污染隐患也将大大减轻。这，就是垃圾分类的基本逻辑。

### 落地

逻辑搞清楚，那就不妨真枪实弹地干起来——先是建好运输、中转、处理系统，做好分类，让垃圾各就各位。而说一千，道一万，垃圾分类只是手段，控制生产才是源头。因而生活垃圾的减量，也要盯牢生产和消费环节。从原材料的获取，到产品的设计制造，再到使用和回收，都让“垃圾”去该去的地方。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事？饮料瓶、牛奶瓶押金制度可能会重现江湖；设计师联名款便携式洗漱用品，还有五秒到达战场；就连买房时，配套分类垃圾房，甚至自带厨余垃圾处理机的小区，恐怕都会更受欢迎。

垃圾分类做好了，有啥好处？一来，宝贵的公共财政资源，可以更多地投入其他民生领域。二来，子孙后代也能从咱们手里，接过环境治理的好摊子，这可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好事。所以，别小看垃圾分类，虽然它是件小事，小到举手投足都会参与。可是呀，垃圾分类也是件大事，它会引领我们走向人居环境更舒适、人与自然更和谐的明天。

（2019-06-27 侠客岛）

（上接第 18 页）

市，需要有提高和完善的空间。还要充分发挥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为进城农民就业和落户定居创造条件。

### 中国的城镇化还有较长一段时间的红利期

如果在增加城市包容性的基础上，从增加就业岗位的现实紧迫目标出发，我们是否可以城市形象和面貌的要求更为朴实一些？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是否可以不要那么过于苛求城市治理？城市街道和门面的治理，是不是可以提倡多元化……涉及的问题太多，关键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是不是站在以人民为本和以发展为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能否进一步深入社区和基层，深入到外来人口集中居住的地方，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

中国的城镇化还有较长一段时间的红利期，毕竟数

亿人口有着在城镇安家落户和逐步改善其在城镇生活、享受公共服务的长久预期。特别是在应对外部挑战的时候，我们更要考虑到增长中的最大变量和潜在内需，来自于农业转移人口所释放的潜能和活力。而正是由于城镇化市场之巨大，才有可能把外部的危机转化为内部的机遇。前提是，我们要明白，两三亿人的高水平发展并不代表中国未来的发展预期。而只有所有城镇居民和新增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同步发展，才是我们抗御外部风险的最大底气。因此，降低城镇化成本，增加城市包容性，释放都市圈、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就业潜力，发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接纳农业转移人口的作用等，都是我们未来可以下的一盘大棋。

（2019-7-12 北京日报）